

走進理學的世界

呂妙芬*



我會成為一位專業史學研究者，連我自己都感到有些不可思議。我記得自己在中學時並不喜歡必須大量背誦的歷史科，考大學時特別選擇理工科系，進入清華大學就讀。大學四年的住校生活是我生命中成長最明顯的一段歲月，同學們在一起做過許多瘋狂和正經的事。除了讀書和社團活動，我常和室友徹夜長聊，那時我們大概都對生命和前途充滿困惑吧，需要不斷地整理自己的思緒和情感，有時候就是並肩望著滿天的星斗，我那位好朋友可以說出整個天空的星座名稱，她喜歡天文。

在那段面對成長的挫折、思考生命意義的年輕歲月裡，信仰也成為我們的話題和嘗試。大三下學期，我決志成為基督徒，但心裡仍有許多疑惑，當時我特別感到自己應該更多瞭解中國文化，也開始修了許多中國文學的課程，畢業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科技部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發展司歷史學門召集人

後又考插班進入臺大中文系。中文系主要是古典文學的課，有濃厚的人文氣息，當時我真的完全沒有擔心出路和工作的問題，就順著感覺在臺大中文系讀到碩士。碩士論文選題時我選了宋明理學的領域，其實理學文本對我而言是困難的，牟宗三等前輩學者的著作，我也讀得很痛苦，按理說我是應該量力地避開這個領域，但那些在生命中某個時刻認真決定以儒學為安身立命的理學家很令我好奇，也因為當時我沒有太強的學術抱負，就沒有太多盤算和擔心，單純想著既然要花時間寫一本碩士論文，就選一個我認為很重要的領域投入，多學一點。我這個想法獲得古清美老師的支持，在她的指導下我寫了比較胡居仁和陳獻章的論文。當時中文系的訓練並不特別講究研究方法和問題意識，就是要求我們精讀文本，再作深入清晰的分析；儘管今天看來這樣的訓練是不夠的，但我覺得這仍是最基本、最重要的研究步驟。

我真正把學術研究當做人生職志是進入 UCLA 歷史研究所攻讀博士之後的事，到美國進修，又轉入歷史學領域，這兩件事對我都是很大的挑戰，即使全力以赴，仍然不容易。我很幸運地在 UCLA 遇到非常優秀的老師和同學，接受嚴謹的訓練，也決定繼續以明代理學來寫博士論文。雖然我的指導教授艾爾曼（Benjamin A. Elman）教授主要從事清代學術文化史研究，但他沒有限制我的選題，他只是要求我論文不能只處理思想觀念，要同時留意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脈絡，選課也要儘量多元。格外幸運的是，兩位日本明清史大家溝口雄三先生、夫馬進先生先後到 UCLA 訪問開課，我修了他們的課，學到許多明清史的知識，也見識到日本學者嚴謹的治學態度。

現在回想起來，我在博士班階段很重要的學習突破是，要自己找到一個具原創性和新研究視角，又可以執行的博論題目。雖然我在修課期間閱讀了許多史學名著，學習良多，但是那些書的問題意識和精彩論點，都未必可以和我想研究的宋明理學連上關係；當時我自己重複閱讀王陽明、王畿等人的著作，努力想尋找有新意的研究課題，過程並不容易，經常會懷疑自己的能力和判斷，很希望有高人指導。我碩士和博士的指導教授都要求我自己找研究課題，他們不會給我題目，只會和我討論，我後來覺得這是訓練人文學研究生獨立研究的好方法。人文學的研究深切地與個人才性和關懷相關，有時連對史料的感受也很個人化，老師像是陪跑員，依著學生的才性鍛鍊其研究能力。

我從博士論文到現在，都研究明清時期的儒學，尤其是理學。當初之所以想學習理學，主要因為這門學問從北宋開始逐漸成為中國士人的基礎學問，宋元之後更是長期主導科舉的官方意識型態，幾世紀以來中國知識菁英都要學習它。它既是聖賢之學，又是功名利祿之學；既是士人安身立命之學，又可能是

虛偽的政治修辭。無論哪一種，它都深刻地型塑了中國士人的思維與政治文化。因此，即便它在目前歷史學研究中有點冷門，我始終覺得它應該在中國史領域占據重要的地位。

這些年來我共寫了三本書。第一本是博士論文及後續延伸的研究，內容是關於明代陽明學的學派建構、傳播機制、思想內容，以及不同地區陽明後學思想之異同。此書從社會文化史的角度研究明代重要的思潮陽明學，是我進入歷史學完成的第一本書，對我而言，格外有意義。

第二本書探討從晚明到民國初年的《孝經》學與相關的社會文化實踐，除了梳理不同時期《孝經》詮釋內容的流變之外，我花了不少時間找尋《孝經》在不同歷史情境被運用的史料，因為這類史料通常不會出現在《孝經》類文本，而是散落於各類文獻中，同時也思考傳統宗族社會與孝道文化相關問題。這個研究讓我更深刻感受到儒家倫理在傳統社會的底蘊與影響力，它也帶領我的研究從晚明走到二十世紀初。起初我是打算寫一本晚明《孝經》文化史的專書，但隨著研究的展開，我發現不可能不討論清代，對於要投入長時段的研究，當時真的很掙扎，也倍感壓力，書的架構也一改再改。不過，那些年的研究過程也讓我感受到：有時候史料具有一種令人無法漠視的力量，召喚研究者正視一些問題，研究者和史料之間更多是互動的關係。

第三本書是探討晚明到清初思想的轉型，這是一個長期受到學界關注、名家輩出、論著極豐富的研究領域。近年來由於大量文獻重刊，赴國外圖書館閱覽蒐集史料的條件較好，加上資料庫蒐尋方便，有可能突破過去以「著名」或「重要」學者的思想來鉤沉思潮趨勢的作法。我改以理學文本為主要史料，考察當時的理學性論述，試著從一些廣泛受關注的問題叢入手探論，如此研究範圍可以涵蓋更多的學者和文本，也可避免因後代學術史的建構而凸顯某些個別思想家的問題，因而更貼近十七世紀的文本脈絡與歷史氛圍。這本書討論的議題包括：儒者的生死觀、工夫論、舜的聖人形象、萬里尋親孝行、家居拜聖賢之禮、夫婦之倫、人性論，同時也觸及儒學與其他宗教的對話，特別是過去較未受重視的天主教因素。

近年我在十七、十八世紀的儒學個案研究中，看到一些受到天主教刺激而創新儒學的例子，深感興趣。這個學術研究的經驗常令我想起自己在大學時代因為信仰而想研讀中國文化的切身經驗，對於一些中國士人的反應和思維，有時我感覺格外熟悉。未來我希望繼續研究十七世紀至二十世紀的學術思想史，特別是基督宗教與儒學交涉的歷史，這個領域目前逐漸受到重視，我希望這個研究可以帶領我對於中國近五百年的歷史，甚至東亞的歷史，有更連貫而深刻的認識。